

随思录

“轿夫湿鞋”与“破窗效应”

徐健

观看反腐教育片，或翻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剖析材料，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贪腐者大多对“第一次伸手”印象深刻，并为此懊悔不已。

凡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贪腐行为亦如此，只要开了头，心理防线被突破，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一开始的忐忑不安、担惊受怕，到后来的心安理得、习以为常，最终变得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其心路历程大抵如出一辙。这不由人想起“轿夫湿鞋”的故事。

明人张瀚初任御史，参见上司王廷相。这位督台大人跟他讲起自己的一段亲历：昨天乘轿进城遇雨，一个轿夫穿了双新鞋，小心翼翼择地而行，很怕弄脏鞋。可进城后泥雨渐多，这轿夫一不小心误进泥水，另一只鞋也脏了，便“不复顾惜”了。王由此告诫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

矣！”此事，被晚年归隐后的张瀚，写进了史料笔记《松窗梦语》。

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一开始人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大都疼惜有加，小心呵护，一旦遭受污染或损害，便不再珍惜，破罐子破摔。类似情形，也存在于社会群体心理中。

“破窗效应”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和犯罪学家乔治·凯琳提出的。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碎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讲到了“破窗效应”。他指出，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

坚决严肃查处，不破规、不姑息、不放任，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轿夫湿鞋”的故事和“破窗效应”理论，异曲同工，给人以启示：为人处世需自重自爱，始终做到慎初慎始慎微，尤其是党员干部在廉洁自律问题上须把好关口，切不可轻易迈出第一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人生路上总会遇到各种风雨和考验，需要我们很好应对。为官从政更是如此。因为手握权力，受到的诱惑更多，面临的风险更甚，尤其需要党员干部保持定力，洁身自好，切莫轻易放纵自我。有的人正因为放松了警惕，心存侥幸，没有把持住自己，以“下不为例”为借口，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迈出了违法违纪的第一步，最终陷入腐败的泥潭而无力自拔。很多官员的贪腐行为大多是从收受一瓶酒、一条烟，或接受一次宴请开始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贪欲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其结局可想而知。

由此要求党员干部始终秉持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不存非分之想，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用好手中的权力。只有时刻提醒自己，始终绷紧安全之弦，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才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在人生道路上永葆清白、行稳致远。

除了依靠自律，外在的教育、监督和必要的惩处同样不可或缺。作为监管部门，对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当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就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以儆效尤，这是维护风清气正官场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要关口前移，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善于抓早抓小，一旦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就要及时提醒和制止。这好比窗户玻璃出现裂纹时就予以修复，从而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对干部的爱护和挽救，是避免“破窗效应”的主动作为和明智之举。

读史

淝水之战，强大的前秦败亡于内忧

刘钊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看似弱小的东晋打败了强大的前秦。东晋之所以能够战胜前秦，不是因为它比前秦更强大，而是因为，前秦虽有百万之众，但内部存在着巨大隐患。这些隐患，就是前秦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收服的那些降王降将。

前秦统一北方，消灭了很多割据地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王或者将军，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被杀掉，而是加入了前秦集团。比如，前燕的慕容垂投降前秦后被任命为冠军将军，封侯都侯，后来还做了京兆尹。羌人首领姚萏投降后被任命为龙骧将军、都督益梁诸州军事。

前秦的皇帝苻坚，确实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对待黎民百姓和降王降将的态度，还算符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准则。苻坚在收服这些降王降将以后，不仅留下了他们的性命，而且还给他们高官厚禄，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些降王降将被授予的官职，不是一些闲散职务，而是既有待遇又有实权。

苻坚为什么敢这么做？苻坚为什么敢这么做？第一问的答案要问诸葛亮。诸葛亮南征孟获，七擒七纵，图的啥？就是因为马谡的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苻坚是很想学习诸葛亮的，他要的不是这些降王降将的命，而是他们的人；他要的也不是这些人的心，要的是他们的心；他要的更不仅仅是这些人的心，他想收服的是全天下的人心。

苻坚很贪心啊！确实是贪“心”，贪全天下的人心。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吞吐天地之志的英雄，想要赢得全天下的人心，苻坚这么想，政治上绝对正确，战略上绝对高明，不仅对，而且好，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利在百姓。

一个想要赢得人心的人，他会怎么做呢？他一定会尽力善待别人。苻坚想要赢得天下人心，他就要善待天下之人，这是儒家的王道，不是法家的霸道，这是朴素的以人本，不是自私的唯我独尊。中国的历史，不缺坑杀降将、屠戮功臣，不缺苛政如虎、盘剥百姓，缺的是七擒七纵、天下归心，缺的是爱民如子、心系苍生。

这就回答了二问，苻坚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依照正道而行，立志要成为一代圣君。境界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现实选择，格局可以度量一个人的前程远近。但历史不仅仅是由道德境界所决定的，淝水之战后的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前秦后来就是被这些降王降将给瓜分了。

我们不禁要问，苻坚的做法为什么有问题？要评价苻坚的做法对

不对，必须跳出问题本身，联系历史的发展来看待。

那些降王降将，也就是说地方割据政权的王或者将军，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人。借用东汉末年许子将（许劭）评价曹操的一句话，可以说这些人个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成为能臣还是奸雄，有时候不是由一个人内心的想法和品质决定的，而是由外部的形势所造成的，所谓时势造英雄，所谓形势比人强。

这些降王降将，成为奸雄还是能臣，不是看苻坚当时怎么对待他们，而是看苻坚能不能维持前秦帝国的稳定。如果前秦帝国政局稳定，政治清明，这些人没有机会作乱，只能老老实实。但是苻坚恰恰就在帝国后续的政策上面出了问题：他在力量不够的情况下，不满足于只统一北方。

前秦在公元376年才完成北方统一，最要紧的是巩固统治，发展生产，安定人心，徐图大计。如果这样，经过至少两代帝王几十年的努力，统一中国并非不可能。但苻坚急着统一中国，想成为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物，没有充分消化整合内部各种势力，383年就急着南征，而且前秦的核心武装力量——氐人的数量太少，不足以对其他民族构成绝对优势。

一般来说，历史上，君主喜欢的小儿子、宠信的和尚、宠爱的妃子，多扮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奸臣角色。可是苻坚身边的这几类人，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苻苌、最宠信的和尚道安、最宠爱的张夫人，偏偏一个个都头脑清醒、品格端正、直言上谏，劝他不要南征东晋。但急于求成的苻坚，听不进他们的劝谏。

更糟的是，当苻坚有了南征计划，各路降王降将纷纷表态，坚决支持。对他们来说，前秦如果能够统一中国，那也没有什么坏处，还可以继续享受特权。如果前秦失败，帝国就会分崩离析，他们正好可以召集旧部，东山再起，恢复故国。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前秦和东晋互撕，无论谁输谁赢对他们都没啥坏处。说白了，这帮人抱的就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要知道，天下太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束缚，天下太平他们就无机可乘。

说到底，前秦帝国并不是败给了东晋军队，而是败在了自己手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所谓“祸起萧墙”是也。“祸起萧墙”是说，一个组织或一个组织的问题，大多是从内部爆发的。如果内部没有问题，外面的敌人再强大，上下团结一致，也总能克服困难、渡过危机。这正应了我们常说的一个道理，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终归还是内因。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

漫画角



进一步推动高校院系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毛立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明确要求“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是高校院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办学治院发展优势的核心路径。

高校院系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院系党组织不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党建与业务融合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思想认知层面，“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核心理念已普遍树立，党建与业务同根同源、同向同行的认识日益深化。实践推进层面，院系普遍落实党政共同负责制，健全议事决策机制，明确党委在“三重一大”事项中的政治把关和前置研究程序，推动党组织建在教学科研一线、重大项目前沿、机制建设层面，部分院系初步构建起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制衡体系，将党建工作成效纳入考核评价。总体而言，高校院系党建与业务融合已从“形式结合”向“内涵融合”迈进，制度化的融合框架正在形成，党的领导正以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方式嵌入办学治院全过程。

高校院系党建与业务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当前高校院系党建与业务融合仍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思想融合有偏差。有的院系仍有“就党建抓党建”的思维定式，将党建视为“软任务”，把业务当作“硬指标”，对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服务属性认识不足，党建与业务难以形成思想共识。二是机制融合有短板。党建融入业务决策、管理、评价的路径不畅，党委政治把关作用未充分发挥。党组织设置与学科专业建设衔接不紧，考核评价存在“重形式、轻实绩”问题。三是实践融合有差距。课程思政建设有不足，思政元素未能深度融入专业教学。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充分，未将业务难点作为党建重点。四是队伍融合有弱项。党务工作者与业务骨干双向流动机制不健全，部分基层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的政治素养和业务专业能力未能同步提升。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院系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在嵌入治理体系过程中尚未实现深度融合，亟须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制度重构与能力再造。

推动高校院系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对策思路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需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实践导向，从理念、机制、实践、队伍四个维度持续发力，构建全方位、深

层次、常态化的融合发展格局。

强化思想引领，筑牢政治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认识层面解决“为何融”的问题，融合才能行稳致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构建“党委第一议题—中心组学习—支部研讨—师生实践”四维联动学习机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融合发展的具体思路。将党的领导全方位嵌入到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各环节，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党建与业务融合理念，实现思想上的深度融合。

健全制度机制，疏通实践路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只有构建系统完备的融合制度体系，才能为融合提供长效保障。完善党政协同决策机制，强化党委在“三重一大”事项中的政治把关作用，推动“党建入制”，将党组织职责写入各项规章制度。坚持“支部建在教学科研一线”，在重大教改、科研与服务一线动态设立功能型党小组，让一线基层组织成为推动业务发展的坚强堡垒。建立“议题共商、任务共抓、成效共评”机制，推行“党建+业务”项目化运作，实施“班子领衔、支部驱动、党员领办”责任制，把支部工作的关键点和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聚焦点和着力点。

聚焦实践落地，激活内生动力。实践是检验融合成效的唯一标准，只有将融合的“施工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景图”，融合才有生命力。深入实施课程思政

提质计划，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通过“行走的思政课”、专业文化节等打造学科专业特色育人品牌。健全“党政分工牵头—支部一线领衔—党员骨干领办”三级攻坚体系，实施支部攻坚、党员领办项目清单制，推行党员“揭榜挂帅”，深化党员先锋岗创建。深化校地、校企党建联建，切实把组织联建优势转化为人才共育、成果共享的发展合力。畅通师生沟通渠道，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建强骨干队伍，夯实人才支撑。队伍建设是融合的基础工程，只有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骨干力量，融合才能行深致远。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加强政治和业务培训，提升党支部书记统筹融合发展能力。健全党务工作者与业务骨干双向流动机制，推动交叉任职、能力互补，打造党建、精业务的复合型队伍。建立以“发展贡献度”为核心的融合评价体系，将业务发展成效纳入党建考核核心指标，实行党建考核结果与绩效分配、评优评先、职称晋升刚性挂钩，强化“党建不合格、业务不评优”的鲜明导向。

推动高校院系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发展需要，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方能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办学治院的发展优势，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作者单位：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世象管见

吴启钱

曾几何时，在许多讲座的结尾，主讲人的PPT上赫然写着“感谢聆听”四个字。当此之时，本人不禁思索，这份失礼可能不是源于态度，而是源于对传统文化常识的欠缺，是主讲者基本文化素养的不足。因为“聆听”是一个谦词，“感谢聆听”就弄巧成拙了。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误用不仅见于讲堂，在严肃的政治生活中也时有发生。近期，在一些地方的官方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诸如“书记区长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代表委员发言”之类的表述。此类文字的本意，想必是想褒扬领导俯身向下、虚心纳谏的亲民作风，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肯定。然而，由于对“聆听”一词谦敬属性的误解，报道的实际效果却可能无形中颠倒了主客关系，与“褒扬”与“尊敬”的初衷南辕北辙。

要理解其中的谬误，就要先弄清楚什么是谦词。所谓谦词，是中国传统礼仪在语言上的结晶，指说话人通过自谦来抬升对方的表达方式，体现了“自卑而尊人”的处世哲学。例如，古人自称“鄙人”“在下”，称己见为“愚见”，称己宅为“寒舍”。同理，“聆听”也是一个典型的自用谦词，特指自己恭敬、专注地听取他人，其敬意是指向自己所聆听的对象。

在现代生活中，因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这种“文绉绉”又有点“假惺惺”的自谦语，使用得越来越少。但适当地使用，能体现对他人的尊重与自身的涵养，尤其在正式的书面语境中，准确运用谦敬词汇仍是一种基本的表达素养。关键是要准确识别，正确使

谦词的错位

用。

在语言学上，谦词的使用有着严格的人称限制，它只能用于第一人（我），绝不能用于第二人（你）或第三人（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语用红线。我们可以说“我聆听了您的教诲”，这是得体的自谦；但如果说“感谢您聆听我的报告”，则在无意间将自己置于“尊位”，进行了“抬高”，而将对方置于“卑位”，给予“矮化”。这是严重的语用错误，虽然可能不具有“主观故意”，但可“定性”为“重大过失”。

回到前文的报道案例，即便领导再具谦逊之风，报道者也无权代其“自谦”而称其为“聆听”。报道的正确写法，应是客观陈述事实，如“书记区长认真听取了代表委员的发言”。这里的“听取”是中性的动词，不带谦敬色彩，能准确描述行为而不产生歧义。反之，如果报道主体是领导本人或其办公室代为表态，则可以“领导表示，很高兴能有机会聆听各位代表的真知灼见”，这里的“聆听”，作为第一人（我）的自谦，便运用得当。

由此可见，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领导的“谦虚”是否可以被“消费”，而在于我们必须恪守语言的边界，即本人可自谦，叙及他人则当存敬，不可以把“客气”当“福气”。所以，在演讲结束时，与其误用“感谢聆听”，不如一句平实的“谢谢大家”，或正式的“感谢垂听”。在新闻报道中，则应摒弃可能引起误解的谦词，选择中性、精准的词语。

说到底，语言的得体与否，反映的是说话者的文化素养与分寸感。知道“聆听”是什么，可能是我们重拾这份分寸感的第一步。